

# 作为理性的异化的后现代

## ——以伊格尔顿的后现代批判为中心的分析

陈太明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叛,在其论证话语中充满对以理性为根基进行自我构建的现代性进行解构的欲望。后现代实际上延续着现代性所意欲完成的理性解放的使命,虽然其反对理性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宏大叙事,但是就其思想根源而言,实质上仍然隶属于现代性的基本语境。伊格尔顿批评后现代反对理性的同一性而诉诸差异和非理性,从而将自身显示为虚幻的表象与混乱的逻辑悖论。这并未深入到二者更为本质的内在关系中,后现代与现代性在理性概念上的对峙恰恰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两极,而是理性的辩证法自我异化的发展过程。后现代单方面强调了理性自我分离的异化倾向,而忽略了理性经由异化尚需回归从而更新自身这样一个完整的辩证过程。

**关键词:**伊格尔顿;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理性;异化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1)06-0096-08

经历启蒙对人类理性的重新发现之后,理性成为世界建构的唯一可靠资源,人由此从超验的上帝以及传统所塑造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无限建构和筹划能力的理性成为“先验的”前提。正如康德所言:“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sup>[1]</sup>现代与后现代作为同样源出于启蒙的两种哲学理论,虽然在对理性构建世界所承担的角色之认知上存在对立,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二者在精神追求上又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秉持一种视自身为与传统有所区别的断裂意识。现代性以人之理性缺失为其表达断裂意识所针对的对象,而后现代则以理性为其批判的根本,两种不同的路径揭明启蒙之后的思想家分化出的两个相异方向。根据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后现代作为反理性的一方登上哲学舞台,但其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的基本言说体系,其问题域亦未超越现代性的基本范围,从而后现代的口号与信条不过是一些缺乏根据的幻象。伊格尔顿作为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的批判分析颇具思想的深邃性,可谓切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但是深究他对后现代理性迷失的批判,可以发现,其观点仍停留在分析现代性与后现代在具体思想的差异与关联的现象层面,并未深入到二者在逻辑上的内生关系这个本质性层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作进一层讨论,以此为问题意识,笔者将着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在后现代与现代性的理性对峙中,并不能简单将两者归为逻辑的矛盾从而是无根基的幻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幻象的实质是理性自身所经历的异化。后现代不是简单地处在现代性之理性诉求的反面,亦非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处在其所划定的路径之中。从辩证法的异化与回归角度来说,后现代是现代性的“离家”状态,是现代性走出自身进入他者并最终回到自身实现“归家”从而造就一种新的自我认知之辩证过程的一个构成要素。

### 一、现代性意涵辨明

后现代从其称谓即可推知其与现代性的共生关系,揭明后现代之本质,首先面对的是对现代性基本

收稿日期:2021-01-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720003)

作者简介:陈太明(1982—),男,山东莱西人,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意涵的澄明。后现代的观念复杂多变又颇散乱,在被归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中,甚至只有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明确承认过自己的后现代标签。但是,对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有一点是具有共识的,即后现代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将现代性对理性的崇拜作为自己极力反驳的对象。那些反历史、反同一、反确定性的思想观念背后隐藏的皆是反理性这个核心观念。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反理性确立为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意识。若要对后现代的基本观点进行反思,明确其所批判对象的基本含义和理论诉求成为基础性工作。

究竟什么是现代性?颇为尴尬的是,与何谓后现代一样,现代性同样是一个尚未在事实上达成共识的概念。当然,概念界定上的非统一性并不构成对其实质进行分析的障碍。一般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界定现代性。

首先,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因其自觉地与之前状态划清界限而带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它以“后”作为修饰标签表明自身在时间中展开自身并受时间限定的自我意识。当然,现代性的时间性不是历史学编年史和断代史意义上的具体时间,“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sup>[2]</sup>“总序”<sup>2</sup>现代性所昭示的时间乃是旧时代的褪去与新时代的到来之断裂点,它是一种经过革新的新的精神,以现代性的现在作为结合点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由于新世界即现代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别在于它是向未来开放的,因此,时代在推陈出新的每一个当下环节上都不断重新开始。”<sup>[3]7-8</sup>所以,对现代性时间性的判定并不要求哲学家如历史学家般从编年意义上界定现代性,它只告知我们现代性包含对时间的哲学思考,它关注的是现代性之时间意识的时代性和变动性。现代性标志着基于人之理性进行世界建构的新时代的产生,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在现代性经验中的自我更新。

其次,现代性是一个质的概念。如果现代性的时间性主要是一个量的规定性,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从起始和截止意义上准确划定其时间范围,那么现代性在质上来说则相对具有更大的共识,因为现代性确立自身主要是根据其不同于前现代性的质性上的规定性。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乃是建基于对自身在质上区别于其所欲断裂并从而超越的对象之认知上。依靠理性、维治理性乃是现代性的根本规定,通过对具体时间的具体流变进行扬弃以获得普遍规定构成了其本质得以表述的根本。因之,就现代性之质的方面来说,它无疑有自己清晰、明确且一以贯之的质性要求——理性。现代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用理性的自我决定、自我证明精神为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进行谋划,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sup>[3]8</sup>现代性以其尊崇的理性对世界进行祛魅,世界不再是被宗教外衣所伪装的神秘存在。“自因袭的传统解脱出来的能力,亦即比什么都重要的自由的‘启蒙思想’,才是这样一种做事业的生活样式最适合的基础。”<sup>[4]</sup>启蒙通过理性的自我发现,将世界构建为属人的理性世界,而非属神的魅惑世界,这使其根本上获得了一种区别于前现代性的质性上的规定。

最后,现代性同时是一个规范<sup>①</sup>概念。“启蒙的意义在于人类理性的解放,它与蒙昧的神话状态形成相互对立。”<sup>[5]</sup>不论人类理性藉由启蒙达至何种自我规定,又获得了何种解放,最为根本的还是它与规范性概念本身的联系。这就是说,人类在借助理性为自身规划时,并未放弃与之相关的社会道德的以及审美的考量,它的自由并非任性而为并因此是盲目的,而是被限制于经由理性论证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审美趣味之下。正因如此,它并非如霍克海默所分析的那样,是纯然工具性的,并进而深陷神话思维的宰制,好似“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已经支离破碎的自然面前,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

<sup>①</sup> 这里所谓的“规范”之含义借自哈贝马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乃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一项在理性范围内仍然可以通过一种解放意识进一步发挥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就隐藏在理性的规范能力之中,现代社会除了受系统约束之外,社会还有一个源自于生活世界的规范向度。这个向度的作用是,通过把道德的、审美的要素合理化来纠正被工具理性所扭曲的单纯以效率进行评价的标准。对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陈太明:《从神话到解放——论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批判潜能的重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之中。”<sup>[6]</sup>启蒙之后伴随着社会合理化过程的是理性在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分化,但是因为实质理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不可评价性,所以在与工具理性的对峙中,逐渐被可以量化计算的工具理性所取代,最终在现代性语境中社会合理化过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带有强制性的牢笼。韦伯的分析代表了现代性对工具走向的自我反思,也从一个侧面揭橥了现代性思想根源处的规范性潜能。人类社会除了受货币导控的经济和受权力导控的政治要素外,还有具有道德和审美倾向的文化要素作为社会的规范要求规导我们的自我认知,“文化讨论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质,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侩。它探索的是作为目的本身来开发人的力量,而不是为了某个不光彩的功利动机。”<sup>[7]25</sup>面对通过选取适当手段从而最为简便、有效地达成目的之工具理性的强势,哲学不应陷入麻木的非反思性,而是依然需要保持对规范性的敏感态度。

显见,现代性的含义不论如何多样和富于变化性,其理性内核仍然清晰明白。不管是其时间性意识,还是它对自身质性区别于蒙昧意识的自我认知,又或是它的规范性要求,都贯穿着通过理性进行论证和谋划的根基性要求。现代性的理性内核贯通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以及内在世界各个层面的世界理解中,并始终以从魅惑世界中获得人之解放为根本旨归。恰恰是反对现代性所倡扬的理性成为后现代确立自身的立基之本,从各个方面剖解理性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成为后现代登上思想舞台从而确立自身的标志。

## 二、后现代主义的诸诉求及其矛盾

自启蒙运动确定现代性的基本格调是追求真理的同一性、客观性和确定性,并把这种追求放大到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以来,世界被视为必然性的统一,任何偶然性和模糊性都必须被摒弃并被清除出现代性视域。但是,“这种追求普遍性、总体性与本质的哲学在西方导致的结果是,在理论方面,它预设一种思维必须与之相符的本质,一种终极的本源,而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对之加以表象、再现。”<sup>[8]</sup>现代性的这些诉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真理以及理性的追求使理性在两个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一方面,理性超然于一切而成为代替上帝进行宏大叙事的主角;另一方面,理性逐渐单一化为以效用为标准从而是可以进行量度的工具理性。如此一来,启蒙所反对的因上帝而来的宏大叙事被理性所代替,而理性解放所分离出来的工具理性又造成了自由与压制之间互相角力的悖论结果。

与现代性的这些诉求相反,更是为了规避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后现代提出了与现代性相反的哲学诉求。因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之中上帝的存在逐渐减少,所以他渐渐远离理性而只能通过信仰和感情把握”。<sup>[9]41</sup>伊格尔顿对此作了精当表述,“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sup>[2]“致中国读者”1</sup>伊格尔顿对后现代的这一把握方式切中了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因为就断裂意识下的全新自我认同而言,后现代将自己视为与现代性的断裂,它要使自身区别于现代性的理性以及由此建立的同一和有序。后现代断裂的是现代性的理性诉求,它通过批判现代性的理性核心,建立区别于现代性的自我认知。

以不同于现代性而标榜自身的后现代主义借用了与启蒙一样的断裂意识,只是它与启蒙的差别在于,启蒙乃是以反宗教、反权威作为其断裂意识的抨击对象的,而后现代则是打着反理性的旗号进入了思想史的舞台。依伊格尔顿之所见,后现代之反对启蒙理性的诉求可以将之看作一种思想风格和文化风格。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思想风格,“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sup>[2]1</sup>作为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不承认任何基于形而上学基础构建起来的具有稳固性的世界结构,它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由多变易逝的、杂乱无章的诸现象构成,理性所要求的确定和稳固并非其本来样貌。而作为一种文化风格,则是“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sup>[2]1</sup>伊格尔顿正是从这两方面为后现代

的特点作了简要概括,也确立了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理路。不论是作为思想风格的后现代,还是作为文化风格的后现代,都是试图追求那种与理性的同一性相悖的断裂意识。具体而言,伊格尔顿主要从四个方面反驳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

首先,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的真理观念。基于对理性同一性的拒斥,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绝对真理,主张真理是宏大叙事和虚假建构,根本不存在主体用理性构建起来的抽象真理。后现代主义从价值观念出发,将真理视为充满歧异的价值选择,主张真理的多样性和主观性。它认为真理随着主体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历史时间的进展而展现出多样性,并不存在评价多样化真理的统一标准。但是,后现代在此明显是歪曲了现代性的普遍真理的含义,现代性的理性真理追求真理的普遍和绝对绝不是主张真理具有绝对的不可变性和超然的地位,而是在可错论的限定下,赋予其进一步反思的空间,“真理是绝对的,只是意味着如果某事已经被确认为是真理——这通常是项繁重又困难的工作,而且永远是可以进行修正的”。<sup>[7]102</sup>后现代主义简单地把真理视为被真理所绑架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但却混淆了两者,从而导致“在摒弃教条主义的同时将真理也一并摒弃了”。<sup>[7]99</sup>但是后现代似乎忘了自己有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批评权威、批评教条主义恰恰是启蒙的内在精神中已经天然存在的理性构想。启蒙的真理概念以反对权威的非理性为自己的诸多任务之一,它所要求的是,破除权威的迷信,回归到经由理性反思而建构的世界秩序,所以启蒙的理性真理首先承认人的理性相对于上帝的超然理性的有限性,从而在真理问题上将真理的发现视为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

其次,后现代主义拒绝对历史作规律性陈述和建构。依其所见,历史并不适用于以“规律”“进步”之类的词汇进行描述,因为历史本身是无目的的,所谓的目的皆是因理性狂妄地以自己建构起来的主观目的塑造历史的结果。黑格尔主义者把历史视为受绝对精神引导而走向完满,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以压迫和反抗的辩证法诠释历史的进步。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些都是虚妄的“世界历史”观念之产物,历史没有剧本,也没有情节,更没有先验目的。后现代主义不承认通过理性构建的大写的历史,它“把历史视为一件具有持续变动性、极为多样和开放的事物,一系列事态或者不连续体,只有使用某种理论暴力才能将其锤打成为一个单一叙事的整体。”<sup>[2]56</sup>后现代主义想要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组成的历史推动力,它的绝对否定主义倾向因而把历史碎片化和虚无化,从而无法解释碎片化的历史为何会组合成具有压迫并在压迫中产生解放意识的历史规定。伊格尔顿用一种不太激烈的反驳方式,揭示了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历史观中的内在矛盾。他认为,真正的历史观并不是如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碎片和无意识的,而是人类理性的建构和自由创造的结合。

再次,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理性信念。依伊格尔顿之所见,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的本质主义诉求并非没有思想根源,“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的确存在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sup>[2]119</sup>现代性通过人之理性完成自我认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极端化了某些东西,本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这使得一切的世界理解变得抽象而单一,并因此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现代性所坚持的本质主义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理性观念,即事物具有众多的属性,在这众多的属性中,有一个或几个属性是事物的基本属性。如果除去其基本属性,那么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发生变化,事物就会因失去这些属性而成为其他事物。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有两个基本点难以服众,一个是坚持认为本质主义必然使本质上相互不同者隔绝在各自的本体论规定中而变成孤立的;另一个是某物的本质具有绝对的不可质疑性。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这两方面都不能成立。本质主义并非一定认为本质不同者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它也并不假定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总是截然分开的”,<sup>[2]113</sup>而是也可以像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从关系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本质。另外,就对某物的本质之认知而言,“它并不必然包括这样一种信念,即关于什么是某一事物的本质什么不是从来没有任何疑问。”<sup>[2]114</sup>对本质的认知,可以有质疑,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理性能力的增长而进一步增进或发生改变,甚至完全推翻此前的本质性认知。

最后,后现代主义坚持文化的相对主义。如伊格尔顿评价的一样,“在我们的时代里,文化主义已经采取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形式”,<sup>[2]140</sup>后现代将文化视为不可通过理性进行辩护的对象。不同文化当然具有追求自己存在价值的权利,但是文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在于普遍的无标准,而是是否对合法性作出了规范性的承诺,所以它是与真善美的规范性具有内在关系的。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只从文化的生活方式出发,否定文化的整体性和合理性层面。在他们看来,“不存在什么整体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是多样化并且存在异议的。”<sup>[9]137</sup>后现代主义把文化的绝对多样性视为文化的根本特征,文化由此不再是整合社会的有效资源,反而是分裂社会的重要因素。当然,后现代的初衷可能是想赋予各种文化以同样得到尊重的地位,但是各种以文化命名的亚文化形态甚至是非文化形态,诸如暴力文化、变态文化、杀戮文化,显然不能获得其所要求的身份认同。究其原因,不在于这些类型的文化挑战了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违背了文化内在隐含的合理性之规范层面的有效性要求。现代性的理性对因不同传统形成的具有多样化的文化保持一种宽容姿态,但是却需要其提供基于理性进行自我辩护的理由。伊格尔顿对此有颇为清晰的认知,“理性是与宽宏大量相联系的,是能够承认另外一种主张的真实性或者公正性的,即使当它和人们自己的利益与愿望格格不入的时候。”<sup>[2]140</sup>理性所追求的对文化进行判定的理性标准,不是以一种带有霸权倾向的强制去强行普遍化其他文化,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存在文化霸权,但是这并非理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理性使用中所产生的扭曲和异化,现代性所要求的理性始终保持对自我的反思意识和对他者的承认态度。

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以上四个层面的揭示,伊格尔顿睿智地发现了后现代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革命的失败。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虽然表达在反对理性的哲学思想中,但它的实质“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产物”。<sup>[2]29</sup>伊格尔顿所指的政治失败即以理性信仰作为支撑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伊格尔顿来说,后现代的反理性诉求不仅是哲学的自我怀疑或主体性的自我解构,而是对建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失败的政治运动的悲观主义态度的哲学表述。如有学者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中的主体解构理论恰恰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需要,所有个体不分性别、种族和阶级,从而成为可以互相交换的商品。”<sup>[10]</sup>被解构了主体的世界是一个物化的世界,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需要在这种结构中完全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要素,生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如商品经济中的商品一样,成为匿名规则系统主导下的可进行价值估量的存在者,其相互交换的基础不是不能比较的使用价值,而是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并且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的价值。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伊格尔顿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幻象,这种幻象是非理性的幻象,更是理性的幻象,作为政治失败之悲观情绪在思想上的映像的后现代,实际是对工具理性造就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等价交换的再表述。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试图“消除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sup>[7]45-46</sup>等这些差异的做法,反而是主体性意识哲学的再次复归,因为其选用的标准仍然是现代性饱受诟病的工具理性这一理性向度。后现代所宣扬的非理性依然还是理性的,这样的逻辑起点必然导致后现代在自我论证上存在着难以自我辩护的矛盾。所以,后现代作为反叛现代性来确立自身的思想形态,因为它根源自政治运动的失败,所以并非思想上的继承和更新,从而也并非对启蒙的理性精神的合理否定。后现代所标榜的非理性最终只是把不真实的幻象当作真实的加以把握和阐扬。后现代基于对理性的批判而反对普遍真理、目的论、本质主义以及超历史的世界史观念,赋予此诸理性观念以等级主义含义,从而试图以平等的差异为辩护对象,这反而使自己陷入逻辑上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不承认理性通过其抽象能力所获得的同一,它认为差异才是世界的本来样貌,但是当其把绝对的差异视为毫无关联的各个孤立物时,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另一极端。

### 三、理性发展的辩证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伊格尔顿虽然揭露了后现代主义存在的矛盾,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后现代主义的

价值,而是给予了中肯评价。或许正是有这种对现代性的理性缺陷的自我反思,伊格尔顿在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末尾给出了对后现代的一个理论定位,“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sup>[2]152</sup>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伊格尔顿更是直接将后现代称为“晚期现代性”。<sup>[9]6</sup>这就是说,现代性的理性所欲解决的问题与后现代对现代性藉由理性来解决问题的批判,这两种方式根本还是在同一个问题视域之中,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所得出的诸多结论并未给问题提供最终答案。

伊格尔顿在此得出的结论似乎并无多大的新意,他基本上还是赞同将后现代视为现代性未完成的理性任务的一种延续。需要明确的是,伊格尔顿并没有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简单地将现代性归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承袭。因为他也意识到,即使在现代性内部,亦存在对理性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但是,伊格尔顿并未廓清这种反思所指向的基本方向,根本上,现代性的内部反思主要导向对理性所分裂出来的工具理性的反叛,它反对将理性简单地归结于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和可操控性。在这层含义上,也可以说,现代性内部已经播种了未来孕育后现代的种子。伊格尔顿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有一点他忽视了,即理性经由现代性内部以及自认为不归属于现代性的后现代之双重批判,当然可以合理地将后现代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即伊格尔顿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所追问问题的“最后部分”。既然如此,那么后现代的反理性倾向所得出来的那些结论,以及由此塑造的理论形象,就不简单地是幻象或逻辑上相互对立的矛盾能够解释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从理性的辩证法角度进行分析,后现代是理性异化自身的过程性中的一个阶段,而非理性的绝对对立者。

国内著名学者姚大志教授曾就二者的区别有过颇为精确的把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sup>[11]</sup>这里不难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论是现代性的“上帝之死”,还是后现代的“人之死”,根本上还是对同一哲学问题的追问;另一方面,在这种追问中,两者却又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后现代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假象,它追问的是存在者在新的自我理解中的世界建构问题,但给出了推重情感、否定理性的道路。由此,后现代似乎使得任何确定性都变得很遥远,自然、社会、个体变得不可捉摸,历史存在无尽的荒谬,知识变得偶然而无所根据。后现代的解构策略也使得人对主体自身建构的秩序充满了不信任,具有理性并能自我谋划的人失去了借助启蒙之光进行自我筹划的可信赖性。所以,当伊格尔顿指责后现代主义充满矛盾和逻辑混乱从而是一种幻象时,我们可以大胆地作超出伊格尔顿的推定,即后现代无视理性造成的后果不是这种学说难以自证其身,更重要的是,其未意识到自身所从出的问题境遇。

现代性的理性走向工具理性这一点已经被众多哲学家所揭明,但是“可以确信的是,这些并非是启蒙运动的原初规划的一部分”,<sup>[12]</sup>而是理性异化使用的结果。用工具理性反驳工具理性颇具反讽效果,造成的结果是,“至少在一定水平上,后现代对于客观价值的怀疑主义应该正好使它回到了它企图解构的理性的阵营。”<sup>[2]112</sup>就更大的思想史范围而言,后现代虽然把自己看作是反启蒙的一种思想路径,并以此问题意识进行自我确认,但后现代试图解构理性、剥离价值却又曲折迂回地绕回到理性的路向上去。就其通过无理性、无中心反驳启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点而言,它确实履行了反启蒙的宣言。但是,这只是雅努斯的一副面孔,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又仅仅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一种重现。”<sup>[2]111-112</sup>也就是说,后现代没有走出理性的根本在于,它的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对象只是理性不同向度的运用。换言之,恰如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一直存在、经过康德进一步阐扬的理性的不同运用向度一样,后现代实际上依然在继续着启蒙的工作,只是它从理性的差异角度来区隔理性的同一性。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依然在启蒙的话语系统内部讨论问题,它某种意义上是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不是彻底将之摒弃。

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现代性无非是它想极力摆脱的传统。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传统不是现代所要完全摒弃的东西,根本上它是现代所由之从出的先在资源。现代性从传统的母体中抽身而出,这个

过程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掉传统,因为任何的理解都是被传统所决定的理解,它规定了理解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sup>[13]</sup>现代性把一切传统都斥为没有理性基础的偏见,<sup>①</sup>而后现代同样将现代性视为自身所要反对的传统,很明显,两者在根本的思考逻辑上具有同源性,但后现代似乎忘记了自己根源于这个传统并通过它确立自身的基本事实。现代性自身有自己的传承,虽然现代性以反宗教权威来标示自己的断裂,但它仍然承袭了其所欲挑战对象的某些要素。后现代亦然,它一方面承袭了现代性这个传统,一方面也开显出现代性的新的可能。对后现代的理解不应简单局限在它承续了现代性的使命这个层面,而应该从传统和现在的关系入手,通过立足于后现代这个“现在”去思考作为“过去”从而也是后现代源发之地的现代性。如此,我们可以说,后现代在此适时地充当了现代性的批判者从而也是推动者的角色,但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并非在伊格尔顿的意义上只是笼统地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幻象”,而是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另一面相,这副面相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

#### 四、余论

综合以上所论,现代性不是一个遵循工具理性控制而没有任何制约的概念,其理性包含有对实质理性有所承诺的规范性向度。现代性的理性规范问题是被后现代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换言之,现代性尚未在规范问题上得到阐明,后现代便在误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反现代、反理性的问题意识。正是现代与后现代在当代的遭遇,使得这个结论凸显出来,启蒙理解的现代性之具有后现代的趋向是因为,启蒙阵营的学者将理性片面理解为工具理性而舍弃了理性中因主体间性的存在所带有的规范内涵,而后现代则因意识到理性的独白性所可能造成的宰制而极端化地走向非理性。后现代匆忙宣告现代性的死亡的解构论态度并未使自身获得更多的可信性,后现代论者需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理性内涵仍有进一步推动论证的可能性,重建而非放弃理性的核心,以使理性的潜能进一层开发,这才是对待现代性的正确思路。

伊格尔顿对后现代的批判指出了后现代诸诉求的虚妄特征,但是仅仅将之界定为理性的幻象或逻辑的矛盾明显过于简单。这样做的结果造成简单对立现代性和后现代,并完全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将后现代视为与现代性不能共存的矛盾对立之物。后现代在匆忙之中导向了非理性的虚无和相对主义,但就像此前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回到了理性的原点。进而言之,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具有共同的理性基础,二者虽有对立和矛盾,但并非形式逻辑的决然对立。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sup>[14]</sup>现代性背后隐藏着的后现代,其实质并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排斥理性、排斥中心的虚无,而是接续现代性的断裂意识,它本身根本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作为反思意识,后现代并未终结现代性,而是现代性的自我显现。后现代与现代性的这种关系实质上是理性自身经历异化和回归而实现自我更新的辩证法。以理性为根基的现代性经过精神的辩证运动产生出向后现代的异化,这种异化不是否定自身,而是在他者中认识自身。理性经历异化回到自我,现代性也就完成了一次“离家”复又“归家”从而实现全面革新的自我蜕变。

#### 参考文献:

- [1]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M]//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 [2]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sup>①</sup> 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诠释学,任何的理解都是一种带有前见的理解,启蒙运动宣扬挑战权威和传统,并简单地将之斥为非理性的前见,这显然不符合理解发生的事实。传统和权威也可以是理性的,或者正是因为传统和权威被理性所检验,才最终在历史的不断流变中将自身树立为权威。具体的讨论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92-402页。从一种诠释学观点来看,现代性无疑是后现代所面对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仅规定了后现代向现代性提问的方向,也规定了后现代自身的走向,后现代在这种意义上,显然是现代性呈显自身意义所表现出的另一种异化形态。

- [4]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4.
- [5] 陈太明.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J].江汉学术,2013(5):124.
- [6] 霍克海默集[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52.
- [7]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8] 陈嘉明,吴开明,李智,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
- [9]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M].宋政超,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10] 方珏.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0(1):21.
- [11]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8.
- [12] R.A. 萨莱诺.超越启蒙时代——社会理论家的生活和思想[M].傅永军,刘岱,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8-9.
- [13]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4]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 Postmodernism as Alienation of Rationality: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Eagleton's Criticism of Postmodernism

CHEN Taim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postmodern rebellion against modernity is full of the desire to deconstruct the self-constructed modernity based on rationality in its argumentation. In fact, postmodernism continues the mission of rational liberation that modernity intends to accomplish. Although it opposes the grand narrative caused by rational-centralism, it still belongs to the basic context of modernity as far as its ideological origin is concerned. Eagleton criticizes postmodernism for its opposing rational identity and resorting to difference and irrationality, thus showing itself as an illusory representation and a chaotic logical paradox, however, this fails to go into the essential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modernity. Their confrontation in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s not the opposite contradictory poles, b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elf-alienation of rational dialectics. Postmodernism unilaterally emphasizes the alienation dimension of rational self-separation, but neglects the complete dialectical process that rationality needs to return to renew itself through alienation.

**Key words:** Terry Eagleton;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rationality; alienation

(责任编辑:江 雯)